

1. 引言

这次研讨会给我的课题是关于如何把握和记录变化的日常生活的方法论问题。为此，我查阅了近来有关空间、local和locality¹的学术性论述和相关探讨，以求从中寻找民俗学将变化的日常生活当作研究对象的方法。事实上，因为这个主题和我以往的研究内容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尚处于初级阶段。尽管如此，这次仍然要涉足这个主题的理由是，我认为它和之前民俗学所主张的研究方法存在着某种关联性。

日本民俗学家柳田国南先生曾用周圈论对民俗的扩散和传播现象进行理论化的阐释。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E.Soja在论文中说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都市生态学派(Urban ecology)的学者们为了提出都市空间上的因果性这一主张，采用了与柳田类似的同心圆论作为空间分析的主要方法论。(苏贾,2015:286-287)另外，关注工业化时代大众媒体影响力的德国学者赫尔曼·鲍辛格H.Bausinger提出，民俗借助大众媒体超越时间、空间和阶层的边界实现流通，这一情形应该被设定为民俗学的主要研究对象。(鲍辛格,1990)仅从这几个例子也能看出，对空间的关注，以及有关如何将其用于分析的认识，在民俗学的方法论中早就酝酿已久。因而，我这次的发言将对之前出现的相关学术论述进行一个概观，然后在此基础上摸索能够发挥民俗学特长的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论。

2. 日常生活研究的范式

社会学正式开始涉足日常生活问题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当时，对日常生活的学术关注并不只限于社会学，像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等各种学科里有关日常生活问题的研究都骤然激增。这些研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理论传统出发探讨日常生活，因此很难从一个理论背景的角度来说明这些研究的出现，也很难用一种范式paradigm把它们捆在一起理解。即便如此，多种学术领域对日常生活投以新的关注，是因为对原有的占支配地位的方法论所存在局限的批判性反思大量出现，同时其方法论不能捕捉到的新的社会现象也如雨后天春笋般大量涌现出来。

韩国学者姜水泽将上述各种有关日常生活的研究中，关联相对松散但带有一定共同性的观点整理为如下：

第一，这些研究反对用经济或者政治等特定领域的理论去解读社会整体的取向，主张从总体性生活逻辑的观点出发关注生活主体的人。也就是说，认定日常生活不是经济、政治等原有社会结构

或者那些被称为“体系”的领域的边角残余，而是所有社会活动最核心的领域。而且他们还提出，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各个领域，也就是劳动、业余活动、家庭生活，以及其他社会性关系的诸领域，并不是相互分离的，而是内部紧密统合起来的一个总体性单位。

第二，这些研究把焦点投射到既非英雄又非专家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上，关注普通人所拥有的常识和日常生活实践的意义。因此，它们强调的不是自上灌注下来的支配性理论，而是自下而发的实践性理论。再者，这些研究不是外部的观察者，而是内部的参与者，因为他们是从自身的观点出发去把握日常生活世界的，所以不是从局外观察者的理论或者概念出发，而是以生活主体的经验世界、主观意义和实践行为为基础，去重新结构和把握他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概言之，他们所采取的是“自下” von unten、“自内” von innen的认识角度。

第三，对于生活主体的经验和思考，这些研究用动态的、语境(contextual)的方式代替静态的、主观的方式去加以理解和认识。这样的观点克服了个人和社会、主观和客观的二元对立，人被视为交织于时间、空间和社会关系中的一种存在。

第四，这些研究都共同强调应该超越学术领域之间的界限，进行哲学、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俗学和文学等关联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进而批判将抽象性理论建构和经验性研究僵硬地分化开来，强调两者的结合，尤其强调在经验基础上进行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姜水泽，1998: 25-27)

这些研究所共有的观点清楚地表明了上述有关日常生活的各种研究是如何与原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区别开来的。不过，因此这些研究也面对了几个批评，这也是事实。例如说，主要的批评对象包括用主观经验来代替原有的结构的研究;对社会的整体观照不够，而仅仅集中于微观研究的取向;进而还有沉溺于回避概念性分析的反分析态度的取向等等。(科卡J.Kocka, 1987:23-30)

当然，在日常生活的研究当中，原封不动地采用把社会整体结构或者变迁当作独立变数来看待的因果论说明方式，这本身就会成问题，而且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可是，宏观社会结构或者社会变迁是使个人日常生活成为可能的社会环境和历史环境，因此，我们不能对这些所谓早于个人的存在置之不理。事实上，我认为这正是民俗学需要特别警惕的问题，因为民俗学历来是关注村落社会这类相对比较小的共同体当中延续下来的风俗习惯，对其进行调查和研究的学问。

那么，一方面共有上述几种观点，一方面避免以往将微观层面的主观经验用反分析方式来记述的研究倾向，其方法有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出需要多角度思考和深层讨论的问题了。这样，作为展开实质性辩论场的方法之一，要考察与日常生活的关注同步进行的，即对空间、local和locality的学术关注。

3. 日常生活和空间

如前所述，作为“世界内在的存在”，人交织于时间、空间和社会的关系当中。因此，人类解决衣食住，并且持续社会生活，其日常生活的世界将时间和空间、行为和结构作为基本要素包含在其中。换言之，“日常生活的世界是在不同的特定时空中，通过每一天每一天的行为形成的实体。”(金王培，1995:61)在这样的意义上，时间和空间不只是组织人类经验的单纯形式上的范畴，而且是实现日常生活行为的实际存在的基础，也是使日常生活成为可能的基本条件。

然而，尽管有这种本质上的特征，和时间不一样，空间却没有成为在已有的社会科学当中受到特殊关注的对象。德裔美国学者贡布雷希特H.U.Gumbrecht认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特别是作为启蒙主义和近代性产物出现的社会学，是从唯心主义哲学那里获得了思想上的刺激。哲学更重视意

识而不是肉体, 受此影响, 人们把空间和肉体联系起来, 而时间则和意识结合了起来, 这一取向是占支配地位的认识。(贡布雷希特, 1991:56; 施诺尔M.Schrör, 2010:20) 这一取向将时间和流动性、动态性(dynamic)、进步性, 变迁和历史等概念结合起来; 另一方面, 空间则和非流动性、停滞、反动(reaction)、停止和顽固等联系起来, 这种思考方式日益普遍化。(施诺尔, 2010:21; 苏贾, 2015:282) 结果, 空间没有被当成符合以研究变迁和变化见长的社会学理论的对象, 因而在以现代化² 为代表的大部分社会变迁理论当中没能成为变迁的主角。

不过, 到20世纪60年代末, 席卷西方社会的六八学生运动和都市危机成为了引起对空间的新关注的历史性转折点。(苏贾, 2015:289) 当时对空间关注的激增当中, 率先走在前列的是法国学者昂利·列斐伏尔H.Lefebvre和米歇尔·福柯M.Foucault。其中, 列斐伏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与状况决定论(situationism)³ 学者的共同研究, 追踪欧洲几座城市的变迁过程, 在此基础上提出空间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批判和政治对策的核心基石。另外, 这与曾在笔者拙作中提到的“让日常生活成为作品”这一文化革命战略(丁秀珍, 2017:243), 和“新的社会、新的生活若没有新的空间生产为后盾, 只不过是一座空中楼阁”这一主张勾连了起来。(朴荣敏等, 2001:473)

包括以研究空间见长的地理学在内, 有关空间的原有的支配性思考方式是把空间作为物质性的对象, 将其视为表面性的, 同时可以测量的对象。但是, 列斐伏尔在他的核心主张空间生产论中提出, 空间不是单纯的物质性对象。空间是通过我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制造出来的社会性产物。各不相同的空间实践制造出各不相同的空间, 从这个角度来看, 资本主义特有的家、工作单位和业余生活空间相分离的情况, 是以与以往时代截然不同的方式来组织空间的结果。

如果说空间组织日常生活实践的范围和形态,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这一实践就可以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空间。也就是说, 空间实践最早是以利用者的使用价值为主而编制出来的, 这是顺情顺理的。然而, 市场的交换价值给了空间价值一个估价, 这时复杂的资本网络侵入进来, 结果跟着资本网络打转的日常生活被打开了。不过, 空间实践不仅仅是有利于这类支配秩序的再生产。现代科学技术和抽象知识的产物“空间再现Les représentations de l'espace"⁴ 仅部分地介入了空间实践, 导致和资本主义空间重组发生冲突的那些空间实践起了对抗的萌芽作用, 产生出新的空间。(列斐伏尔, 2011: 朴荣敏等, 2001:473-474) 列斐伏尔通过这一空间生产论将结构和行为统合起来, 进而探讨有关日常生活律动性和结构的对抗的可能性。

4. 空间的重组

如果说列斐伏尔和福柯的新空间论批判性地继承了以雅各布斯H.Jacobs和哈维D.Harvey为代表的对空间的思维, 最终出现了“空间的转换”⁵ 这样的表达, 对扩大有关空间的学术性讨论作出了贡献, 那么现实社会的急剧变化, 即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也给空间思维的扩大营造了重要的环境。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推动力产生的结果, 这一点上不会有异议。哈维将这样的时代性特征描述为“时空的压缩”, 用时间打破空间上的壁垒, 这在资本主义展开的一系列历史中得到了持续性的推进。例如说铁道和电线, 汽车、收音机和电话, 喷气式飞机和电视, 以及最近的电子通讯革命等等, 这些就是在生产和流通的网络中, 在消费的整个部分中, 为合理组织空间的资本主义性质动机所带来的代表性事例。结果, 不仅仅有全球化被“时空压缩”这样的表达, 而且还涌现出了“距离的消失”、“无场所社会”、“空间的收缩”、“地理学的末日”和“空间的末日”等等修辞表达法。

不过, “全球化带来空间的消亡”这样的看法是有问题的。因为, 作为反抗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形式, 站在全球化(规模scale)对立面的local(规模scale)的再区域化re-territorialization有所进展。施诺

尔强调，尽管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经济、政治和社会活动从特定的空间获得自由，但这不是空间的消失。反而是场所或者local占据了反对、对抗全球化影响力的位置，从而得以幸存下来。（施诺尔,2010:193）⁶ 哈维也指出，在剧变的世界当中，个人在local中寻找确立自身认同的根基。而且他极力强调，这种“场所认同(place identity)”在对抗资本的斗争中可以发挥有限但是有效果的力量。（哈维，2004:352-353）以这一逻辑为基础，施诺尔提出主张空间消亡的那些命题夸大了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影响力的削弱，他批判这样的认识暴露出了将一般的政治和国家政治、空间和物质性领土混为一谈的局限。（施诺尔,2010:193）

资本主义的动态性和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体系的发展，同时也是有助于提升local再区域化的又一种动力。因为，随着空间壁垒的减少，对“空间内场所差异”的资本敏感度则相应提高。和企业的选址战略相关，全球资本由于时空的压缩，在有保证的弹性和移动性基础之上，可以更巧妙地利用local劳动市场的特殊性或者local社会的文化特征和传统等等。这一点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性口号“思想全球化，行动local化(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上得到印证，这个口号转用了全球企业的口号。全球资本在将local同质化的瞬间，提醒了local是對抗资本的場所，模糊了對抗的对象。

站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来看，与其说全球化导致了空间的消亡，不如说这是国家划界后形成的原有国际秩序被“local/国家/全球化”之类新的空间结构重新组合了，这样的看法应该更为妥当。当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能仅看作是规模差异基础上的一种垂直组合。因为它们既是多层次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以复杂的方式相互给予对方影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公约就是全球机构和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理论与国内政治理论的交叉，目睹local层面上发生的事件给另一半球local造成影响的情况并不是件难事。国际组织化削弱了国家的权利和机能，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国家间的紧张和冲突仍然对全球治理构成威胁，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结果，当我们展望今天的全球化时，原有的中心/周边模式，或者是像经济决定论那样的还原论说明方式都不再合适。从这一角度出发，美国学者阿帕杜莱Appadurai提出应该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复合的、多层次的，带有脱臼disjunctive秩序的产出过程。（阿帕杜莱,2004:60）即，全球化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门类的世界潮流中存在的根本性脱臼”，这些脱臼中或许由此造就出不确定的情景，全球化是在这之上产生出来的“同一性和差异无限多样化的，相互竞争的产物”，这是阿帕杜莱给出的定义。（阿帕杜莱,2004:79）

5. locality和日常生活研究

这里关注的是哈维和施诺尔提出的local和场所认同问题。首先来看local，local可以被界定为“作为物理性、社会性的空间单位，指用地域或者地方来命名的国家的下属局部单位。”（文载媛,2016:307）可是，全球化时代的local不能用这种既客观又空洞的方式来定义。因为比什么都重要的是，由于大量的迁徙移居和电子媒体的扩散，人们的活动和居住领域持续不断地去区域化⁷。人们一方面要直面原有的安稳的local不断被侵蚀和内部遭受破坏的情况，另一方面积极参与把场所认同即“locality”建构成偶然而不成熟的形态。（阿帕杜莱,2004:345）⁸

阿帕杜莱认为，locality“是由社会的直接性，个人间的相互沟通方式和语境间的关联性等连接起来的一系列环环相扣的纽带来形成的”，是“通过人的行为的主体性、社会性和再生产的可能性等等，再现其自身的现象学资质phenomenological qualification”。这个资质也是“通过有意图的行为生产出来的，同时产生特定物质效果的情感结构”。例如说，人们通过集体仪式生产出local的主

体,通过给特定场所贴上名字,或者修建房屋、道路和农田,制造出界限,由此从时空的角度生产出locality。(阿帕杜莱,2004:345)从这一点来看,locality是人们一边对应从外部入侵的一系列事态,一边围绕自身创造各种条件,营造一个宜居之所的实践的产物。

如果再把这个理论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论联系起来看,这里的locality和列斐伏尔所说的空间实践有着诸多关联。人们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制造出来的抽象性、知性研发成果“空间再现”,以将空间使用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创造对抗空间。列斐伏尔把这个称为“再现空间”*Les espaces de représentation*。这个空间拒绝印刻在那里的支配编码,以此被腾空的可能性场所用想像力来填满,作为他们情感依据的该空间,既是以热情和行动为转移的场所,也是被体验的场所。例如说,自我、床、房间、家、广场、教会、墓地等等是这些空间的例子。从这个角度来说,再现空间本质上是质量的和流动的,也是有语境的和关系性的。

列斐伏尔认为“再现空间”就是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和精神分析家们所关注的研究对象。不过他们的问题是,在把那些空间当作对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和再现空间共存当中,一致或者不一致,或者以那样方式相互介入的“空间再现”置之不理,忽视“空间实践”,列斐伏尔对此提出了批判。(列斐伏尔,2011:91-92)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需要再来听听他提出的空间生产三角辩证法 *trialectics*。让我们再来关注“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的对立关系。如果说“空间再现”是遵从言语化的结构秩序而来的支配性空间定性理论,那么“再现空间”就是与之对立的体验性空间。如果说科学上的空间认识,或者有关空间的严格的体系化尝试是“空间再现”的例子,那么通过艺术作品进行的去空间的尝试就可以算是“再现空间”的代表性例子。例如说,伦敦的滑板选手(skateboarder)托比Toby到了晚上就会占领利物浦大街办公楼区街的街道,在那里尽情练习滑板。在这里,作为身体体验练习场的空间使用价值,和作为写字楼空间的市场交换价值,两者之间始终存在冲突。虽然他最终会被赶到其他地方去,但是对于烙上“这里不行”的“NOs”空间质疑其到底“有什么不可以的”,要将其转化为用鲜活的身体标记的“YES”空间,这就是“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的差异。(博登I.Borden,1998:49;朴荣敏等,2001:476)

然而,这两者间的关系不能仅仅看作是对立的。仅仅看作对立的它只作为理性的、不言自明的道理,只是它作为精神上的反思对象时。如果关注一下这些对立性要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并生产出空间的,可以发现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要素不只是以对立关系存在的,而是持续不断地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且,它们之间的对立还通过作为日常生活实践样式的“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变得多重化。也就是说,“空间实践”综合了“空间再现”和“再现空间”的对立,并将其反映出来,或者有时候它与这两者也会失和,在与这两项不同的层面上介入空间总体的生产。

为了理解有关空间的这三个动因,列斐伏尔对其所采用的有关身体的说明进行了展开论述。“空间实践”-“空间再现”-“再现空间”的关系可以划分为“感知的”(利用身体器官感知外部世界)-“认知的”(与意识形态相混合,有关身体的普及性解剖学和心理学知识)-“体验的”(感到拘束或者不舒服的体验的身体)。只有这三个要素集合到一起,一个集体的成员才不会迷失,才可以顺利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去。不过,这三个动因分别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介入空间的生产,它们之间的关系既不单纯也不稳定。因此,对这三个动因的区别只是一种抽象性的理论模式,一种原理上的接近,而不是用自身对现实空间作出的完整解释,为了获得对空间的具体的认识,更需要的是历史角度的接近。(列斐伏尔,2011:90)

对于动态地叠加在一起的三动因的三角辩证法,以及作为结果产生的空间事例等等,列斐伏尔提出应该进行历史性探索的理由,是要表明空间基本上表现为政治性的空间,展示出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冲突是在何种层面上发生的。另外,通过三者之间的动态辩证法,创造出对抗资本主义支配性空间的新的、有差别的空间,对这一可能性的探讨,是列斐伏尔关注日常生活和空间更为真实的理由。

像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论，而且在前面考察的有关空间的讨论，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研究方法论有重大的启示。受篇幅限制，本文里要更具体地提供这些分析案例是比较困难的，希望能参考我写的相关论文加以理解。⁹不过，这里提供有关空间的论述对日常研究的几点启示，以此作为结论。

第一，从空间的角度接近日常生活对于我们研究日常生活而言，可以作为有效的方法将可设定的空间规模具体化。

第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论与其说是阐明以往被民俗学、人类学研究者所容易忽视的日常生活空间的多层次构成形态，不如说是提供了一种用动态而多层次的方式将变化的日常生活对象化的线索。

第三，上文中提到的“空间转换”范式主张，空间的本质性特征是社会性要素和政治性要素的贯穿一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需要把locality，即具体生活现场展开的日常生活形态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空间实践联系起来关照，进而应该认识到，这与制造“有差别空间”的空间政治不是没有关系的。

注释

- 1 这里的“local”和“locality”与通常理解的“地区”和“地区性”相比，在本论文中是带有西方理论背景和含义的重要学术概念。作者在韩文原文中直接采用了音译的做法，中文译文中也直接沿用英文，力求减少多国学术对话中的误解。论文中涉及到的其他西方理论术语，则一般采用译文后同时标注术语原文的办法。——译注
- 2 韩文中一般称为“近代化”，这与韩国学界时代划分用语有关。——译注
- 3 韩文通常译为状况主义者。——译注
- 4 这一术语是构成列斐伏尔空间生产论的核心概念。后文有更详细的说明。
- 5 这是苏贾在1989年首次使用的一种表达，之后被很多社会、文化学者通用起来。坦率地说，这个表达借用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语言的转换”，用来指对空间的学术性关注和讨论的扩大。（杜尔灵J.Döring&蒂尔曼T.Thielmann,2015:7-17）
- 6 这里“场所place”这个表达是一种区别于空间的既抽象又普遍的区分方式，特指带有具体的、个别的和限定的意义的空间。
- 7 韩文中采用“脱区域化”的说法。——译注
- 8 金硕洙将“locality”译成地区性。他认为，在这里地区性指的是“特定空间和时间，将居于其中的躯体统合起来，以此超越单纯的物理上的空间性，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和意义等统合起来，以这样一种实体形式呈现的生活的现场。”（金硕洙，2010：35）
- 9 参考丁秀珍的相关论文《差异空间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在都市空间里创建村落》。（丁秀珍，2018：109-135）

参考文献（未特别注明的原论文均为韩文）

- 阿帕杜莱 A.Appadurai 2004, 车元铉等译,《脱缠的现代性》(韩文)(*Modernity at large*), 首尔: 现实文化研究。
- 哈维 D.Harvey 2004, 具东会译,《后现代的条件》(韩文)(*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首尔: 한울。
- 苏贾 E.Soja 2015, 李起淑译,“从‘时代精神’到‘空间精神’: 有关空间转换的新歪曲”(韩文), 杜尔灵和蒂尔曼 J.Döring & T.Thielmann编《空间转换》(*Spatial Turn*), 首尔: 심산。
- 鲍辛格 H.Bausinger 1990, 德特默E.Dettmer译,《技术世界中的民间文化》Folk Culture in a World of Technology,(英文), 布卢明顿和印第安纳波利斯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列斐伏尔 H. Lefebvre 2011, 梁英兰译,《空间的生产》(韩文)(*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首尔: 에코리부르。
- 贡布雷希特 H.U.Gumbrecht 1991.“后现代空间”(德文)(*Nach moderne zeiten räume*), 罗伯特·魏曼 Robert Weimann 编《后

- 现代——全球差异》(Postmederne-globale Differenz), 弗兰克·福特 Frank-furt, 54-70。
- 博登 I.Borden 1998, “对城市生活的一个确认: 20世纪末城市里的滑板和社会空间审查”(An Affirmation of Urban Life : Skateboarding and Socio-Spatial Censorship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ity), *Archis*5 (有关英国的特刊)。
- 科卡 J.Kocka 1987, 韩云锡(音译)译,《雇佣劳动和阶级的形成》(*Lohnarbeit und Klassenbildung*), 首尔: 한마당。
- 施诺尔M.Schrör 2010, 郑仁模等译,《空间、场所、界限》(韩文)(*Räume, Orte, Grenzen*), 首尔: 에코리부르。
- 姜水泽 1998,《日常生活的范式——现代社会学的理解》, 首尔: 民音社。
- 金硕洙 2010, “21世纪社会的locality和人文学”,《去现代、去中心的locality》, 首尔: 혜안, 19~50。
- 金王培 1995, “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世界”,《韩国社会学会社会学大会论文集》, 首尔: 韩国社会学会, 59~68。
- 文载媛 2016, “围绕locality概念的困扰”,《locality人文学》15, 釜山: 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 305~314。
- 朴荣敏、金南州 2001,《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 国土研究院编《空间理论的思想家》, 首尔: 한울, 470~481。
- 李尚峰 2008, “去现代, 空间的再区域化和local、locality”,《韩国民族文化》32, 釜山: 釜山大学韩国民族文化研究所, 1~30。
- 丁秀珍 2017, “日常的媒体化和媒体的日常化”(中文, 刘正爱译),《日常生活和文化》3, 东京: 日常生活和文化研究会, 241-252。
- 丁秀珍 2013, “全球化时代的韩国民俗学和locality”,《民俗学研究》33, 首尔: 国立民俗博物馆, 167~187。
- 丁秀珍 2018, “差异空间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 在都市空间里创建村落”,《实践民俗学研究》31, 首尔: 实践民俗学会, 2018, 109~135。